

本書副標題為「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可見是一部較總體性的社會環境史專著，在對疾病的深入分析方面也有筆路之功。書中使用了大量地方防疫站、檔案館、衛生處的記錄材料和調查報告，珍貴而獨特的材料也顯示了作者的辛勞與調查實踐。在疾病史的問題討論上，儘管對中醫文獻的運用和解釋可能會有舛悞，如「大頭天行」、「疙瘩」與「親戚不相訪問」等等，但書中還是充滿了對文獻中疫病同名和不同名記錄的辨析和推敲。而在作者熟稔的專長領域，區域地貌、生態的敘述和分析更是一種很努力地展示疾病從動物到人的影響過程，這也更加賦予讀者繼續深入探尋瘟疫史、疾病史、環境史與社會史之間交集的動力，繼續追尋諸如病理與症狀的對應性、疾病載體和傳播機制、環境與社會變遷的相關性等問題，這些都是本書的開拓和留給讀者的思考。

陳博翼

北京大學歷史系

**行龍，《走向田野與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12，473頁。**

區域社會史研究是當前學者對於深化社會史研究的共識和努力的方向，是實現理論本土化的一條重要路徑。《走向田野與社會》是作者10年來實踐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學術結晶。在著作中，作者着重於對近代以來影響山西社會歷史發展的水利、集體化和晉商等專題的實證研究，並將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貫穿其中，理論與實證、文獻與田野、發現資料與闡釋歷史相互結合，從而實現了歷史研究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社會史向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轉向。作者用「走向田野與社會」來概括史料、研究內容、理論方法三位一體的區域社會史研究（頁7）。

開篇，作者以〈自序：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對自身的學術經歷進行了一個回顧與檢討。作者坦言，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學術探索離不開中國社會史發展的大背景，自己的學術探索經歷了社會史、區域社會史、人口資源環境史、集體化時代社會研究等幾個階段，簡言之，就是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從《中國近代社會史》、《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近代山西社會研究》直到今日的《走向田野與社會》，是作者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親身實踐，也在一定程度、一個側面

反映了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史發展的路程軌跡（頁1-2）。

在論集中，作者分別從理論反思、水利社會、集體化時代、紳商與地方社會、發現歷史等5個主題23篇論文，對明清以來山西社會所產生的深刻變化作出觀察與思考。

第一部分，作者對社會史、區域社會史的發展脈絡詳細梳理，並對社會史、區域社會史研究做出理論反思與方法討論。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發展經歷了「本土化」的歷程，在研究方法上體現出跨學科的鮮明特色，並需要「優先與人類學對話」。針對目前社會史研究的不足，作者重提整體觀、長時段與現實感。追求整體觀需要通過重提政治史、避免瑣碎化的路徑來實現。重提政治史，並不是要回歸到原來的政治史研究框架，而是要增強從社會史角度重新審視政治史、制度史的學術主動性和敏銳感，注意考察社會史的政治語境；堅持「長時段」和「現實感」，需要打通近現代史的分析框架，將中國社會史研究下延至集體化時代，注重現代社會史的研究（頁28）。當前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熱潮是社會史研究走向深入的結果，為了避免瑣碎化的危險，必須加強區域間的比較研究、重視區域歷史的分期和加強對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頁44-48）。隨着社會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田野歷史學家」的工作越顯重要，作者強調以歷史學為本位的田野調查工作，就是強調田野調查對於擴充社會史、區域社會史研究資料和加深對歷史感悟與理解能力的重要意義。

區域社會史研究強調把握區域特性，「水」是至關山西歷史發展的主線，並因此而形成「水利社會」。第二部分主要集中於對「水利社會」的研究。社會史研究以人口問題為起點，作者在國內較早出版了近代人口史研究的專著，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積累了人口、資源、環境之間互動的問題意識，並最早宣導從社會史角度開展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史的研究。明清時期的山西人口稠密而水資源嚴重不足，生態和社會的平衡被逐漸打破。各流域村莊常常因爭水而發生械鬥事件，這時的「水」不僅至關個人的生存，而且是整合流域村莊的家庭、鄰里、村際關係、地域聯盟的紐帶，也是影響當地各種社會關係衝突與分化的重要因素。民眾通過利用傳說、民間故事和形塑水神來爭奪水權，地方水利管理的組織、制度和用水秩序的形成，即受到非正式的民間規約、慣習等因素的影響，也有正式的官方權力的介入。村莊作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公共團體，是國家與社會的關聯體。作者通過國家權威、地方權力的分配與實踐、信仰與傳說的民間文化、生態環境、天然資源、自然災害等要素，在歷史過程與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構中對「水利」社會作出「整體性」把握。從「治水社會」到「水利社會」，凸顯的是研究視

角的轉換和研究程度的加深。

山西的集體化時代也頗有特點，從抗日戰爭時期李順達的第一個互助組到「農業學大寨」，可謂一路風光，家喻戶曉，是全國的典型，也是研究集體化時代中國農村的資料庫（頁32）。第三部分的主要內容是對集體化時代的探討，作者選取了西溝、張莊、剪子灣三個較為典型的村莊為研究對象，自下而上地建構集體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社會史研究不是撇開政治，也不是棄重大歷史事件於不顧，而是要把這些與具體的人、具體的事件聯繫起來，與具體的「社會」發生聯繫，作者強調注意考察社會史的政治語境，尤其是對集體化時代的研究。文章看似集中於對國家政治權力在地方實踐邏輯的探討，但實際上展示出的是普通民眾在集體化時代中的多維生存圖景。作者將民眾在「集體化」影響之下的經濟發展、心理與行為邏輯、複雜多變的社會關係以及國家制度在地方的微觀實踐充分地展現出來，並將集體化時代本身看成是「一個多種行為主體和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頁171），這一時期鄉村中充滿政治色彩的日常生活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因政治語境的變化而變化，同時村落固有的傳統文化和關係網絡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頁240）。從此種區域社會史研究中，我們看到了鄉村社會的複雜性與多面相，也看到了鄉村背後是以何種面貌呈現的「國家」。

明清時期的晉商馳騁中外，號稱「海內最富」，對地方社會的歷史發展必然產生重大影響，作者在第四部分的討論主題是紳商與地方社會。晉中商人的崛起，不僅是明朝國家「開中制」創造的契機，也由山西晉中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促成，這是論者集中討論的兩種因素。作者認為除此而外，人口、資源、環境長期互動之下自然和社會生態失衡造成了生存壓力，促使更多的人從事商業，也是晉中商幫形成的重要因素。明清時期山西商業高度發達，但商會的創立卻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這是因為不平衡的商品經濟發展、封建行會勢力的強大束縛了晉商觀念的轉變，推遲了山西商會的創立，但其仍然在促進民族資產階級成長、組織協調地方商業活動、參與地方政治、教育公益事業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作者還突破了以往晉商研究中「就商言商」的局限性，從社會史角度對晉商與地方政治、經濟組織與經濟活動、社會生活、秧歌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互動進行了探討。這樣，將各項相關要素納入晉商活動的主題之下，使得晉商和晉中地方社會的面貌更加豐滿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也使許多問題得到更為深入的解釋。

第五部分作者注重對新資料的發掘與解讀。走向田野與社會，可以搜集到各種不同種類的地方民間文獻。社會史的復興，使以往不登學術研究大雅之堂

的詩歌日記、碑刻族譜、報紙廣告、手札、回憶錄、契約賬簿等愈益得到研究者的青睞與重視。作者通過對晉察冀畫報的解讀展現出抗日根據地「戰爭、革命、生活」的激烈碰撞；運用竹枝詞描繪出山西民眾的生產生活、歲時節令和婚喪嫁娶的民俗、煙禍、賭博和溺女流弊的民風等的民生百態相；從清末民初農村一個普通商號的帳冊中揭示出其經營脈絡、過程及其背後反映的地域經濟生活；通過對村莊基層檔案的梳理挖掘出其中所包含的經濟活動、政治運動、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人際關係、社會救助、人口家庭等各方面的內容；展現了雖是一位普通鄉紳，但已經成為社會史研究注意的熱門人物劉大鵬的三種遺作，並從其個人的心態、思想觀念、歷史命運來透視新舊交替時代下社會結構、社會生活、西學教育、新政事業等的社會變遷。作者在史料的搜集與運用上是自覺的，這些研究展現了什麼可以作為研究區域社會史的史料，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運用和解讀這些史料的方法。

走向田野與社會，也可以更好地解讀文獻。田野工作能激發靈感，萌生新的問題意識。有學者認為做田野工作必須帶着強烈的問題意識進入，否則就像一隻無頭蒼蠅。但作者的體會是，問題意識有時是預設的，有時卻是在田野工作中偶然萌發出來的，甚至一次與鄉老的談話，一塊荒草中的碑刻都能偶然激發問題意識，這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靈感，只有置身於鄉土的場景中才能體悟到（頁24）。走向田野與社會，不僅僅只是資料範圍的擴大和搜集資料方法的改變，研究者對歷史的解讀方式發生了改變，對歷史認識的方法、研究的方法也發生了改變，這樣就可以深化對歷史的理解，甚至改變以往的研究結論。

總之，作者以田野調查為起點，將第一手的地方民間文獻與田野感悟相結合，將歷史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相互結合，並從社會學、民俗學等學科中汲取研究方法和有用的問題，從具有時空特徵的具體情境出發，從水利社會、晉商和集體化時代的村莊把握山西的歷史發展脈絡，在討論中兼顧環境、經濟、政治、文化、人口等的橫向因素以及國家、紳商、普通民眾等的縱向因素在地域社會的交錯互動，以此來把握區域社會的運行脈絡與機制。在田野調查中收集史料和解讀史料，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煉區域語境中的本土化理論和研究方法是該論著的突出特點，不僅在現實意義上促進了山西區域社會發展問題與歷史關係的探討，而且從學術意義上豐富了區域社會史的研究。

鄧宏琴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